

王安石詩文選讀

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

注译



王安石詩文選讀

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
注

人民文学出版社

一九七五年·北京

王安石诗文选读

人民文学出版社出版

(北京朝内大街166号)

新华书店北京发行所发行

北京印刷三厂印刷

字数 60,000 开本 787×1092 毫米 $\frac{1}{32}$ 印张 3 插页 2

1975年9月北京第1版 1975年9月北京第1次印刷

书号 10019·2306

定价 0.22 元

北宋时期的法家代表 ——王安石

十一世纪时,中国封建社会逐步向后期过渡。当时,阶级矛盾进一步发展,民族矛盾也十分尖锐。北宋大地主阶级奉行儒家路线,对内疯狂兼并土地、对外实行投降政策,造成了“积贫积弱”的严重局面。王安石站在中小地主阶级立场上,反对大地主阶级守旧、卖国的儒家路线,推行法家革新、爱国的政治路线,发动了中国历史上有名的熙宁变法运动,力图改变这一形势。伟大的无产阶级导师列宁对王安石作了科学的评价,称他为“中国十一世纪时的改革家”①。

王安石,字介甫,号半山,临川(今江西临川县)人。宋真宗赵恒天禧五年(公元一〇二一年),他生于一个经济、政治地位都比较低的州县官吏家庭。青年时期,“自百家诸子之书,至于《难经》、《素问》、《本草》、诸小说,无所不读;农夫女工,无所不问”②,受到法家思想的影响。他在父亲任职各地时随父生活的过程中,亲身体验了大地主、大官僚对中小地主、下层官吏的压制,目睹了兼并势力造成的“民劳财匮”的社会状况,

因而早就怀着改革的愿望。宋仁宗赵祯庆历二年(公元一〇四二年),他二十二岁以进士身份登上政治舞台。庆历七年至皇祐元年(公元一〇四七——一〇四九年)他任鄞县知县时,“起堤堰、决陂塘,为水陆之利;贷谷与民,立息以偿,俾新陈相易,邑人便之”^③,作了改革的尝试。直到嘉祐五年(公元一〇六〇年)被召入朝担任三司度支判官前,他在各州县任职将近十七年。这更使他有广泛地接触社会现实,坚定了改革决心。宋仁宗嘉祐三年(公元一〇五八年),他写了著名的《上仁宗皇帝言事书》,提出系统的改革主张。“顾内则不能无以社稷为忧,外则不能无惧于夷狄,天下之财力日以困穷,而风俗日以衰坏”,王安石在这个奏疏中正确地指出了宋王朝面临的严重形势。阶级矛盾尖锐、民族危机深重、国家财政空乏,这正是北宋中期的社会特征。他还在这个奏疏中严厉批判大地主顽固派“偷惰取容”的精神状态,大胆呼吁最高统治者根据“所遭之变”来“改易更革天下之事”。此后,王安石还屡次上书,特别是在嘉祐六年(公元一〇六一年)写的《上时政疏》中,他指出宋王朝已到了非马上改革不可的时候了。

宋神宗赵顼上台,才采纳王安石的变法主张。熙宁二年(公元一〇六九年)二月,王安石出任副宰相,熙宁三年(公元一〇七〇年)升为宰相。他一掌权,就抓住“理财”和“整军”这两大课题,从政治、经济、军事各方面努力进行改革。

“理天下之财者法”^④。王安石首先建立制置三司条例司,抓了议变旧法、推行新法的领导机构。接着颁布了一系列新法。熙宁二年九月下令实行青苗法,规定在青黄不接的时

候,由官府按户等每年两次发放农业贷款、每次取息二分,以抑制大地主的高利贷盘剥。王安石说,这样做“凶年可使熟户常保其土田,不为大姓兼并”^⑤。同年七月还宣布均输法,根据“徙贵就贱,用近易远”的原则,由官府派发运使视各地物产多寡、收成丰歉、物价高低,统一征购、转运,加以调节,使盈虚相补,满足军储国用,减少人力财力的浪费,防止大商人的投机活动。同年十一月又推行农田水利法,鼓励垦荒和兴修水利,规定要“均济疏通”,反对大地主垄断水利。翌年又公布免役法,要原来享有免役特权的大地主阶级交纳助役钱,其他人按户等交免役钱,使农村的劳力用交钱的方式代替服役,能够按时耕作。熙宁五年(公元一〇七二年)制定了方田均税法,要求重新丈量土地,按土地数量和等级征收赋税,限制大地主阶级的经济特权。这年还公布市易法,成立市易司,平抑物价,继均输法之后进一步打击大商人利益。王安石是清楚地看到兼并所造成的“富者财产满布州域,贫者困穷不免于沟壑”^⑥的状况的;同时他也能认识“欲富天下则资之天地”^⑦的道理。因此,王安石的一系列理财措施,贯穿着抑制大地主兼并、调整地主阶级内部对地租剥削的分配比例、在发展社会生产基础上增加国家财政收入这一基本思想。

“守天下之法者吏”^⑧。为了培养和壮大地主阶级革新派的队伍,王安石改革了教育制度。他整顿了太学和州县学府,还建立了武学、医学、律学等专科。他废黜儒家经典《春秋》和一切陈腐的先儒传注,代之以自己用法家思想编撰的《三经新义》,颁行全国,作为必读的教科书。王安石吸收了历史上

法家任人唯贤的历史经验，还改革了科举制度。他说：“（汉）高祖之任人也，可以任则任，可以止则止”，“后世循高祖则鲜有败事，不循则失。”^⑨他反对以诗赋声病取进士，以记诵默写试明经，槟斥不学无术的“腐儒”，重视真才实学，破格地提拔了一批有志于改革的中下层士大夫，为新法的推行建立了骨干队伍。

王安石变法遭到了大地主顽固派的疯狂进攻。熙宁七年（公元一〇七四年）夏，王安石被迫罢相。但他于熙宁八年春再度担任宰相时，仍然坚持推行新法。大地主顽固派当然不能容忍。熙宁九年（公元一〇七六年）十月，王安石再次罢相。宋哲宗赵煦元祐元年（公元一〇八六年），新法在顽固派的反攻倒算下彻底失败，王安石怀着忧愤的心情去世。尽管他任宰相两次总共不过九年，但他却把自己的一生都同新法联结在一起，不愧“改革家”的称号。

王安石不但是地主阶级改革家，而且是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爱国主义者。在这一意义上说，王安石变法又是一次爱国主义的政治运动。

北宋中期，我国境内北方的辽和西北方的西夏贵族反动政权不断侵扰中原地区，严重地阻碍了我国北方地区生产力的发展。大地主阶级“斥地与敌，守内虚外”的卖国投降路线又助长了敌人的气焰，威胁着北宋的生存。

王安石尖锐地批判了大地主阶级的投降媚外路线。他写了《白沟行》等爱国诗篇，抨击当权的大地主阶级投降派不择良将、不修边事，放手让敌人来吞噬土地、虏掠人民。在《澶

州》诗中，他对大地主阶级津津乐道的“澶渊之盟”的所谓胜利作了辛辣的讽刺，表示了鲜明的憎恶态度。他还在《河北民》中无情地揭露了大地主阶级强取豪夺人民的耕织成果去“事夷狄”的卖国贼本相。他尖锐地指出：“示弱太甚，召兵之道也”^⑩，揭露大地主阶级妥协投降的政策助长了敌寇的野心，导致了民族的灾难。“由来犬羊著冠坐庙堂，安得四鄙无豺狼！”^⑪亡国的祸根不正是那些反对变革、反对前进、奉行儒家反动政治路线的顽固派吗？与斥责投降派相反，王安石对历史上的爱国将领十分怀念。“气略人推李广优”^⑫，他热情歌颂西汉时抗击匈奴奴隶主侵扰有功的爱国将军李广。他非常推崇汉朝的苏武与张骞等与匈奴奴隶主贵族进行过长期斗争的爱国志士，认为“丈夫许国当如此”^⑬。对爱国者的歌颂，正是对卖国贼的批判。

王安石推行了一条积极防御的爱国路线。他打击大地主兼并势力，领导变法图强的革新运动，为反击辽和西夏反动统治者的入侵作好物质准备。王安石在变法中，不但以“理财”增强国力，而且以“整军”改变北宋王朝腐朽的军制。熙宁三年秋，他下令试行将兵法，让有勇有谋、武艺精良的爱国将领训练、掌握军队，以后又加以推广。他采用商鞅的“什伍之法”，使农村的壮丁受到军事训练，以配合正兵抗击敌寇，达到逐步改变募兵制、恢复征兵制、裁减北宋“冗兵”的目的。他还设置“军器监”，推行“保马法”，改良武器，养好战马，以增强军队的战斗力。他针对当时孔孟之徒“以执兵为耻”的现象，要人人“朝夕从事”武事，“以射御为急”，而“威天下守国家”^⑭。

王安石更有收复沦陷于辽反动统治集团之手二百多年的富庶辽阔的燕云十六州的爱国宏愿。正是在他的领导下，采取了断西夏右臂的战略方针，在变法期间即熙宁五年到六年（公元一〇七二——一〇七三年），取得了“熙河之役”的胜利，收复了大片失地，为保卫中原腹地建立了屏障，为收复燕云十六州打下了基础。这在整个北宋王朝抗战历史上是最大的一次军事胜利。

王安石又是一个地主阶级的进步思想家。他在政治上执行的这条革新、爱国的进步路线是以他的法家思想为指导的。

儒学莫盛于宋。正是在北宋千篇一律尊崇孔丘的情况下，王安石敢于尊法反儒。他在青年时就嘲讽儒学无用——“肯言孔孟犹寒饥”^⑮。他把孔丘讥为“仆仆然劳其身”整日等待作官的官迷^⑯。他大胆提出上智、下愚“非生而不可移也”^⑰的命题同孔丘“唯上智与下愚不移”的反动论调直接对立。而他对那些信奉孔学的“腐儒”、“俗儒”、“庸儒”的批判就更多了。也正是在法家遭受谩骂、打击的时代，王安石敢于肯定法家。他在大地主顽固派借攻击商鞅来反对新法的声浪中，针锋相对写出自己崇敬商鞅、誓行新法的战斗诗篇——《商鞅》。他甚至要求宋神宗向商鞅学习耕战政策。他称赞秦始皇的郡县制说，“郡天下而不国，得之矣！”^⑱充分肯定秦始皇的加强中央集权、巩固新兴地主阶级政权的法家路线。王安石正是从自己革新、抗战事业的需要出发，吸收提倡变革、主张抗战的法家思想，创立“荆公新学”作为新法的理论根据。

王安石的变法路线是以他的唯物主义哲学和朴素辩证法

的观点为基础的。“三不足”精神就是对孔丘“畏天命、畏大人、畏圣人之言”的直接挑战,集中体现了他的进步思想。

“天变不足畏”是反天命的唯物主义战斗口号。大地主顽固派以“畏天命”的唯心主义信条为理论武器,把当时的山崩、旱灾等归罪于新法,狂叫“去安石,天必雨”。宋神宗在顽固派的攻击面前也“忧见容色”,欲罢新法。王安石坚决地说:“水旱常数,尧汤所不免”,“但当修人事以应之”^{①⑨},强调只有坚持变法才能战胜自然灾害。他更直截了当地宣布:“天地与人,了不相关,薄蚀震摇,皆有常数,不足畏忌。”^{②⑩} 王安石就是这样用“反天命”的唯物主义观点,批判大地主阶级顽固派的唯心主义陈词滥调,维护新法。

“祖宗不足法”是强调发展变化的朴素辩证法的观点。大地主顽固派为维护他们的既得利益,视一切变革为洪水猛兽。他们的代表司马光公然写信攻击王安石“尽变更祖宗旧法”,使他们“无一人得袭故而守常”。王安石同他们针锋相对,说:“尚变者,天道也。”^{②⑪} 他认为事物“有耦”、“有对”,在矛盾斗争中发展,而且“耦之中又有耦焉,而万物之变遂至于无穷。”^{②⑫} 他反复强调,假使再事事因循弊法,不敢有所改革,北宋政权必定维护不下去。王安石的变法实践,正是基于这样的发展观点,对北宋王朝“恩逮于百官者唯恐其不足,财取于万民者不留其有余”^{②⑬}的传统国策作了大胆冲击。

“人言不足恤”更是体现了勇于前进的反潮流精神。大地主阶级为维护自己的政治、经济特权,疯狂攻击王安石及其新法。“邪说营营,顾无足听”^{②⑭},王安石在顽固派的攻击面前,

反而更激烈地批判那些据经泥古的儒生,在著名的《答司马谏议书》中他揭露大地主、大官僚“不恤国事、同俗自媚于众”的丑恶嘴脸,决心“不量敌之众寡”,“辟邪说,难壬人”,把新法进行下去。“寒逼清枝故有梅”^{②5},王安石正是在当时儒法两条路线的激烈斗争中成为我国北宋时期杰出的法家的。

文艺,历来是阶级斗争、路线斗争的重要工具。王安石的许多诗文是紧密地为其政治路线服务的。“所谓文者,务为有补于世而已矣”^{②6},这句话清楚地表明了他的文学基本主张。王安石的许多诗文,特别是变法期间的不少诗文,是鼓吹变法、抗战的舆论工具,是捍卫革新、爱国路线的锐利武器,是闪耀着尊法反儒思想光芒的战斗篇章。他提倡“以实用为本”^{②7}、“明而不华”^{②8}的健康文风,尖锐地批判了风行一时的地主官僚文人艳冶的颓靡文风。他的许多诗文语言明快、说理透彻,表现了简炼、泼辣的风格。充实的政治内容、高度的文学技巧,使王安石成为我国北宋时期的著名文学家。从我们这个篇幅有限的小选本里,也可以看出,把文学活动同变法运动有机结合在一起正是他的特色。

王安石变法是在王小波、李顺等领导的、在我国第一次提出“均贫富”战斗口号的农民起义震撼了北宋政权的基础上才得以施行的。这次变法打击了大地主兼并势力,在一定程度上减轻了劳动人民的差役赋税负担,对封建生产关系有所揭露和调整,并兴办了一些农田水利事业;同时改革了军制,增强了反抗辽和西夏反动统治集团的掠夺性战争的力量。这

些,都有利于社会生产力的发展,客观上部分地符合了农民群众的利益。特别难能可贵的是:王安石在孔学发展为极端反动的理学时,能够打破儒家反动思想的禁锢,向孔孟之道作了大胆的冲击,打破了死水一潭的沉闷空气。

但是,王安石毕竟是地主阶级革新派。王安石变法只是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的一次改良,他曾公开宣称变法是为了防止象汉末张角、唐末黄巢那样的农民起义。因此变法不可能从根本上改变贫苦农民受压迫、受剥削的地位。变法派的社会基础是薄弱的,王安石只能依靠宋神宗赵项自上而下推行新法。因此许多变法措施只是议而不行或行而不果,变法的失败是必然的。同时,王安石对儒家思想的批判也是不彻底的,他的变法是披着儒家外衣进行的,我们在阅读他的诗文时必须注意这一点。

王安石变法距今已有九百年。如何评价这场斗争成为中国历史上儒法斗争的重要问题之一。

研究这场斗争,可以使我们进一步看清林彪反动、卖国的地主资产阶级本质。北宋以后,凡是搞复古倒退、投降卖国的孔孟之徒都诋毁王安石。南宋道学小丑邵伯温冒名苏洵写了《辨奸论》,搞什么“见微而知著”,断定王安石是“大奸慝”。南宋话本《拗相公》也写了“最恨邪言三不足,千年流毒臭声遗”的反动诗句。那个儒家卫道士朱熹更是杀气腾腾地叫嚷王安石不知以“克己复礼为己事”,致使“新法之祸率至于横流而不可救”,落在孔丘手里会遭“少正卯之诛”^②。这些大地主阶级

的代表如此恶毒攻击王安石正是为其把持的南宋苟且偷安、投降卖国的反动政治路线服务的。叛徒、卖国贼林彪也鹦鹉学舌要“见微知著”，妄图窥测时机，以求一逞，颠覆无产阶级专政。他谩骂王安石是“拗相公”，正是借咒骂王安石来攻击坚持毛主席革命路线的广大中国人民，以达其梦寐以求的“克己复礼”即复辟资本主义的反革命目的。这就正好暴露了他同中国历史上最黑暗、最反动、最腐朽的大地主阶级一脉相承的关系。林彪是现代中国的大儒。

研究这场斗争，有助于我们对现实阶级斗争的长期性、复杂性的认识。林彪以及历代的反动派对王安石的不断攻击告诉我们：对一个大的变革肯定还是否定的斗争会长期作为阶级斗争的一种形式继续下去，被打倒的敌人是时刻想篡案、想复辟的。王安石变法不过是在不根本触动封建制度基础的情况下作些改良，却引起了大地主阶级的激烈反对。他们不但大造反变法的舆论，而且在他们主管的部门或统辖地区之内，阻挠、破坏新法的推行。大官僚富弼、韩琦就拒不执行“青苗法”法令，反而上书宋神宗进行诽谤。顽固派的代表司马光还公开宣称：他们同王安石等革新派“如冰炭之不可共器，寒暑之不可同时”^⑧，这个家伙一上台就把新法全盘推翻，发泄仇恨。这个事实也启示我们：共产主义事业是与传统的所有制、传统的观念实行彻底决裂、消灭一切剥削和压迫的革命。这个革命的深刻性，是王安石的变法所无法比拟的。无产阶级所遇到的地主、资产阶级的反抗将更加疯狂。因此，无产阶级同资产阶级、社会主义同资本主义、马克思主义同修正主义两

个阶级、两条道路、两条路线之间的斗争无疑将更加尖锐、更加复杂。在社会主义阶段中,存在着资本主义复辟的危险性,我们要认识这种斗争的长期性和复杂性,对资产阶级实行全面专政。“我们从现在起,必须年年讲,月月讲,天天讲,使我们对这个问题,有比较清醒的认识,有一条马克思列宁主义的路线。”

研究这场斗争,还可以使我们清楚认识内政与外交的紧密联系。对外政策是对内政策的延续。大地主顽固派的政权,正如马克思所说“在民族义务和阶级利益二者发生矛盾的时候,没有片刻的犹豫便把自己变成了卖国政府”。北宋的大地主顽固派甚至勾结外敌破坏新法。辽反动统治集团害怕王安石变法使“中国安强,有窥幽燕之计”^⑧,因此派兵压境,武装威胁,破坏新法。大地主顽固派立即呼应,公开主张“将契丹所疑之事”,如将兵法等新法统统罢去,“以释彼疑”^⑨。辽统治者也日夜盼望司马光上台,曾别有用心地向北宋提出“司马光何不为中丞”^⑩。而顽固派的头子司马光一上台,果然将新法全部废除,甚至要将熙河之役夺回来的大片河山拱手交还敌人。北宋内外反动势力互相勾结的事实证明:尊孔复古与尊孔卖国总是联系在一起的。如果不能在内政上执行一条革新、前进的正确路线,就不能坚持抗战的爱国主义立场。刘少奇、林彪之流反对无产阶级专政,仇视无产阶级文化大革命,妄图阻挡中国人民的社会主义胜利进军,决定他们必然走上卖国投敌的道路。我们一定要深入批判刘少奇、林彪修正主义路线的卖国主义本质,巩固无产阶级专政,切实做好

反侵略的准备，把中国的事情办好，为人类作出更大的贡献。

上海第一纺织机械厂工人理论小组
上海师范大学中文系七三级工农兵学员

【注释】

- ① 《列宁全集》第十卷：《修改工人政党的土地纲领》注。
- ② 王安石：《答曾子固书》。
- ③、⑭ 《宋史·王安石传》。
- ④、⑧ 王安石：《度支副使厅壁题名记》。
- ⑤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二二。
- ⑥ 王安石：《风俗》。
- ⑦ 王安石：《与马运判书》。
- ⑨ 王安石：《委任》。
- ⑩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九。
- ⑪ 王安石：《开元行》。
- ⑫ 王安石：《送李太保知仪州》。
- ⑬ 王安石：《飞雁》。
- ⑭ 王安石：《上仁宗皇帝言事书》。
- ⑮ 王安石：《忆昨诗示诸外弟》。
- ⑯ 王安石：《行述》。
- ⑰ 王安石：《性说》。
- ⑱ 王安石：《周秦本末论》。
- ⑳ 《司马温公传家集》卷七十五。
- ㉑ 王安石：《河图洛书义》。
- ㉒ 王安石：《洪范传》。
- ㉓ 赵翼：《廿二史劄记》卷二十五：《宋制祿之厚》。
- ㉔ 《王荆公年谱考略》卷十六。

- ②5 王安石：《生日次韵南郭子二首》（其二）。
- ②6、②7 王安石：《上人书》。
- ②8 王安石：《张刑部诗序》。
- ②9 《朱文公集》卷七十。
- ③0 《司马温公传家集》卷十七。
- ③1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三八。
- ③2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二六二。
- ③3 《续资治通鉴长编》卷六十六。

目 录

北宋时期的法家代表——王安石	1
----------------------	---

上时政疏	1
------------	---

答司马谏议书	11
--------------	----

上五事劄子	19
-------------	----

取材	30
----------	----

性说	40
----------	----

与马运判书	49
-------------	----

答曾子固书	55
-------------	----

登飞来峰	60
------------	----

详定试卷二首(其二)	61
------------------	----

郊行	64
----------	----

寓言十五首(其三)	65
-----------------	----

元日	67
----------	----